

社會主義饑荒的多維透視

——評文浩《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董國強、林小靜



文浩 (Felix Wemheuer) 著，項佳谷 (Jiagu Richter) 譯：《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一 引言

有關中國1958年大躍進之後出現大饑荒的研究最早始於西方學術界，並在過去數十年中慢慢形成

了一些頗有深度的中心議題和學術辯論。總的來說，大多數西方學者的現有論著主要聚焦於中共高層的政治決策和政府政策的社會影響。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薄克敏 (David Bachman)、泰偉斯 (Frederick Teiwes)、孫萬國和陳仲禮着重論述了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在大躍進中的角色和作用^①；貝克 (Jasper Becker) 和馮客 (Frank Dikötter) 則比較強調毛澤東個人意志的重要影響，並側重描述了這場大饑荒的慘狀，馮客甚至直稱這場大饑荒為「毛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②；凱恩 (Penny Kane) 則從人口學角度分析了這個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化，採用了較為中性的表述，稱這場大饑荒為「1959至1961年饑荒」^③。

在大饑荒的發生地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場饑荒被主流輿論宣傳淡化為「三年困難」，而導致「三年困難」的原因，則被簡單地歸結為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因此，克服「三年困難」的努力便被順理成章地昇華為一部愛黨愛國、艱苦

有關中國1958年大躍進之後出現大饑荒的研究最早始於西方學術界，並在過去數十年中慢慢形成了一些頗有深度的中心議題和學術辯論。大多數西方學者的現有論著主要聚焦於中共高層的政治決策和政府政策的社會影響。

在作者看來，弄清楚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中國在1959至1961年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饑荒？為甚麼這場饑荒會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為甚麼此後再也沒有發生此等規模的饑荒？

奮鬥的社會主義英雄史詩。關於「三年困難」的一般情形，往往僅限於糧食短缺、副食品短缺、日用商品短缺、「瓜菜代」等概念化的抽象描述。大量人口死亡的事實，被刻意地封存在外界難以接觸的黨政機關檔案文件中；很多官方檔案文件還是千方百計地迴避事實，將因飢餓和營養不良導致的疾病或死亡歸咎於其他原因。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這場大饑荒的真實情形才隨着眾多親歷者回憶錄和回憶文章的面世而逐漸浮出水面，成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集體撰述、於2011年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提到，「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④，事實上確認了這場大饑荒的存在及其嚴重後果。不過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此前已有不少中國學者利用地方檔案資料、地方志和民間歷史文獻研究大饑荒，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曹樹基的《大饑荒：1959-1961年的

中國人口》和楊繼繩的《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⑤。這類著作在研究資料的系統性和史實描述的翔實程度上，大大超越了西方學者的相關論著。

儘管大饑荒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相關論著數不勝數，不過由於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不同，關於這場饑荒形成的原因和導致的死亡人數，不同學者之間始終存在着巨大爭議。例如，對於這場饑荒形成的原因，一般可以歸結為中共高層基於烏托邦理想而提出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規劃、群眾性的大煉鋼鐵運動對正常農業生產造成的衝擊、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減產、人民公社大食堂對糧食毫無節制的耗費、「浮誇風」引發的高徵購對農民基本口糧的剝奪、各地官員為逃避問責極力隱瞞當地的饑荒情況、中央高層為了顧惜「社會主義中國」的面子而拒絕進口糧食等。但這些因素是單一地發生影響還是綜合地發生影響，以及在各種因素的影響權重排序上，現有論著



改革開放以後，大饑荒的真實情形才隨着眾多親歷者回憶錄的面世而逐漸浮出水面。（資料圖片）

依然眾說紛紜，令廣大讀者莫衷一是。而關於這場饑荒導致的死亡人數，更存在着從數百萬到數千萬的巨大差異^⑥。令人悲觀的是，隨着近年來國內檔案資料的開放程度日益收緊，加上主流輿論宣傳的基調變化，看來這些原本有希望逐步澄清的問題還將長期被爭論下去。上述狀況使我們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近翻譯出版的《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和期待。

二 主要內容和核心觀點

本書作者是德國青年學者文浩（Felix Wemheuer）。他早年就讀於德國波鴻大學，2000至200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留學，2004至2006年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他曾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並先後任教於維也納大學和德國科隆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當代史，曾在一些具有國際影響的報紙和學術期刊上發表不少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研究文章，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本書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評價本書「體現了近年來歷史研究中的一種新興路徑：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中重新審視」（頁vii）；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辛逸也盛讚該書，謂「文浩教授對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大饑荒的比

較研究，是前無古人的大膽且成功的嘗試，將兩次饑荒概括為『饑荒政治』更是神來之筆！」（封底）這些點評的確抓住了本書的特點。

在這本共有260頁、約二十三萬字的專著中，作者圍繞中蘇兩國大饑荒的起因和過程，分四個部分展開論述：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比較」，着重分析中蘇兩國出現大饑荒的共同的體制性根源；第二部分「毛澤東時代中國飢餓問題的政治化」，着重談論中蘇兩國（以中國為主）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應對糧食供應短缺問題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政策舉措，以及國家權力對社會經濟活動過度干預所造成的始料未及的嚴重後果；第三部分「邊遠地區的饑荒」，分別以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和毛時代的西藏為例，着重論述饑荒問題如何成為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核心內容，進一步彰顯了饑荒與政治的微妙關係；第四部分是終章與結論，着重探討中蘇兩國政府克服大饑荒的努力以及大饑荒對社會主義實踐的消極影響。由於知識範圍的局限和研究興趣使然，我們對本書的評論更多地聚焦於有關中國大饑荒的論述上。

目前國內外關於這場大饑荒的研究論著，大多側重於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推算，以及大饑荒期間農村悲慘情狀的細緻描述。就一些年長的中國學者而言，這樣的問題導向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是那場大饑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他們的一些親友死於大饑荒，自己也曾飽受飢餓之苦，因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然而，作為一個來自西

文浩的論述具有與普遍中國學者不同的國際比較視野，以及對饑荒話題的長時段的歷史關照。對全球範圍饑荒現象的歷史回顧，旨在說明1960年前後發生的中國大饑荒並非一個獨特的、孤立的歷史現象。

作者的論述凸顯了「饑荒之國」的歷史遺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因素，從而大大淡化了中蘇兩國最高當局的個人影響。作者指以馮客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將大饑荒的主因歸咎於毛個人的意志，過份誇大了毛的決策的實際影響。

方發達國家的青年學者，文浩有着完全不同的問題導向。在他看來，弄清楚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中國在1959至1961年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饑荒？為甚麼這場饑荒會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為甚麼此後再也沒有發生此等規模的饑荒？

基於其獨特的教育背景和學術經歷，文浩的論述具有與普遍中國學者不同的國際比較視野，以及對饑荒話題的長時段的歷史關照。他在本書〈前言〉提到愛爾蘭、印度、德國、蘇聯等國漫長的饑荒歷史，例如，「1846至1850年愛爾蘭饑荒期間110萬至150萬人餓死，1879至1902年期間1,200萬至2,900萬印度人死於饑荒」（頁 xviii）。在蘇聯，除了本書用於中蘇比較研究而受到重點關注的1931至1933年間斯大林農業政策引發的饑荒之外，作者還提到1921年、1941至1943年以及1947年戰爭導致的饑荒（頁8-9）。在中國，除了大饑荒，作者還特別提到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幾次饑荒，例如，在1876至1879年和1896至1900年間，有1,950萬到3,000萬人死於饑荒；1928至1930年華北大旱導致1,000萬人死亡；1938年黃河大堤決堤衍生了400萬難民，90萬人因饑荒和傳染病喪生（頁4-5）。這種對全球範圍饑荒現象的歷史回顧，旨在說明1960年前後發生的中國大饑荒並非一個獨特的、孤立的歷史現象，儘管造成歷次饑荒的原因不盡相同。這為我們認知與反思這場大饑荒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基點。

當然，作者也注意到另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即在二十世紀全球死於饑荒的人口中，中國和蘇聯佔了80%。基於這個事實，他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及其歷史和政治根源進行了剖析。他認為，導致1930年代蘇聯大饑荒和1960年前後中國大饑荒的歷史根源，在於中蘇兩國的農業生產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糧食供應不足的情況普遍發生，而且不同時期的政權也沒有形成對抗饑荒的有效機制。換言之，中蘇兩國都是由貧窮落後的「饑荒之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國家（頁 xvii、4）。在全體國民始終掙扎在飢餓邊緣的情況下，「如果計劃出了重大的誤差，就會造成不僅是牙膏和肉類等物品供應的問題，而是會出現極為嚴重的饑荒」。而導致兩國饑荒的政治根源，在於「中國和蘇聯政府啟動了野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規劃，希望以此改變他們國家的落後面貌」（頁229）。這種政治決策的主觀動機和現實考量當然無可厚非，然而兩國共同面臨的一個客觀現實是：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又處於十分不利的國際環境中，兩國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只能來自本國的農業。這就使原本根基脆弱的農業經濟雪上加霜，進而引發全國性的大饑荒。作者稱這種饑荒為「發展式的饑荒」或「大躍進饑荒」，以區別於人類歷史上其他類型的饑荒（頁 xxvii）。

作者的以上論述凸顯了「饑荒之國」的歷史遺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因素，從而大大淡化了兩國最高當局的個人影響。在具體分析中國大饑荒的成因時，作者不同意以

馮客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看法，指他們將大饑荒的主因歸咎於毛個人的意志，過份誇大了毛的決策的實際影響（頁 xxxi、28-29）。

在認定了導致大饑荒的主要因素之後，作者還在本書的不同章節就一些其他因素作出討論和辨析。例如，他認同糧食減產和高徵購的疊加效應是導致大饑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提到中國農業生產在1959和1960年下降了30%以上，其中有八個省份的產量下降了40%至50%（頁19、124）。此外，從1952至1979年的逐年糧食徵購情況看，1959和1960年是糧食徵購比例最高的年份，分別佔當年糧食產量的39.7%和35.6%。極為相似的是，蘇聯的糧食總產量在1930至1932年間下降了約30%，而這幾年裏政府徵購的糧食數量增加了一倍（頁19-20）。但對於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實際影響，作者持保留態度，並引用楊濤的觀點：「只有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的高峰時期在新建的公共大食堂裏，在很短的時間裏有『過度消費』的情況，這個時間太短，不足以解釋1960年幾百萬人的死亡。」（頁 xxxiii）

這場大饑荒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持續時間長達三年之久。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較為深入地探討了中央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救濟措施的原因。作者將1949年中共建政後一系列重要事件都納入到「國家—農民衝突」的解釋模型之中，較為系統地論述了合作化運動、統購統銷政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旨在說明中共政權與農民的關係是如何一步步惡化，雙方的信任危機是如何

一步步加深。作者認為，自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以後，國家的糧食徵購辦法對農民不公平，價格偏低、比例偏大，但由於國家掌握着立法權和話語權，農民只能採用「瞞產」、「私分」等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基本權益。在1957年開展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這個問題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對於農業合作化和國家糧食徵購計劃的抱怨，變成了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頁65-66、70-72、78）最終政府通過種種政治高壓手段實現了當年的糧食徵購任務，這個結果對政府而言是坐實了關於農民「瞞產」、「私分」的指控。所以當1959年大饑荒在農村爆發時，「黨的領導總覺得農民在假喊餓，目的是破壞糧食徵購」（頁85、243）。因此，1959年國家糧食徵購比例空前絕後地達到糧食收成的39.7%，饑荒救濟措施更是無從談起。

這場大饑荒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絕大多數非正常死亡發生在農村地區和農業人口中。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作者在本書首次較為系統和詳盡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糧食政策：伴隨着工業化的城市化，使得有權獲得糧食供應配額的城鎮居民數量以百萬為單位增加，給中蘇兩國原本捉襟見肘的糧食供應帶來新的壓力。為此，兩國不得不實行差序性的糧食配給制度——儘管這一制度有悖於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在城市中，「兩國政府優先保證供應的群體是相同的，即重工業行業的工人，以及軍人、高級知識份子和黨的幹部」，「從農村來的臨時工、家庭婦女、小孩、退休人員和殘疾軍人」受到歧視，「待遇最差

作者將1949年中共建政後一系列重要事件都納入到「國家—農民衝突」的解釋模型之中，旨在說明中共政權與農民的關係如何一步步惡化。此外，本書首次較為系統和詳盡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糧食配給制度的二元化差異。

關於這次大饑荒的後續影響，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斷。第一，這場饑荒嚴重加劇了農民對國家的不信任感，進而影響了農民融入社會主義體制的意願。第二，這場饑荒迫使中共領導層放棄不切實際的發展計劃，延緩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

的是勞改營的勞改犯」；在農村地區，一些種植工業用植物和木材的農民可以得到糧食配給，而「普通農民則完全得不到國家分配的糧食」（頁46）。

結合書中其他章節的相關論述不難看出，至少在中國，這種糧食配給制度的二元化差異是十分明顯的：無論處於哪個等級，城市人口的供應指標都是固定和得到保障的；而農村人口的供應指標只是糧食消費的下限規定，實際消費量完全取決於各地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換言之，生產糧食的農民不但在糧食消費標準方面處於底端，而且即使這樣的消費標準也是政府沒有擔保的。這種二元化差異在大饑荒期間達到極致：中共高層在確認大饑荒的真實性後，第一反應依然是「保衛城市」，尤其是優先保障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線城市和瀋陽等重要的工業地區。結果這些城市居民每天一斤以上糧食的定量基本得到保障，只有副食品供應嚴重短缺；而在農村很多地方，儘管毛澤東要求農民的糧食消費指標維持在每天一斤左右，但實際人均消費量只有100至200克，還有「很多農民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僅靠樹皮和野菜度日，甚至餓死」（頁105-12）。作者據此認定，「農民餓死的原因是他們在當時的供應機制中沒有獲得糧食的權利」（頁123）。

對大饑荒主要成因的認定，必然影響到對終結大饑荒的各種措施的效用評估。很多現有論著認為，1960年代初中國農村集體化政策的鬆動與微調，如允許農民持有少量自留地、允許農民進行「包產到戶」試驗、由地方政府「借地」給農

民「度荒」等，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和糧食產量得以在短期內快速回升，對緩解饑荒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作者則認為，「1961年和1962年改革帶來的糧食增產並不能對饑荒的終結作出解釋，要作出這樣的解釋必須考慮城市與農村關係的調整」（頁xxxiii）。在他看來，調整城鄉關係的最重要舉措有兩個：一是大量持續進口糧食，二是大規模精簡城鎮人口。他依據羅平漢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在1961到1965年間每年平均進口500萬噸糧食，這個數字「是北京、上海和遼寧年糧食消費的70%到80%」。與此同時，政府還發起上山下鄉運動，將2,600多萬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並通過實行嚴密的戶籍制度阻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顯而易見，大量進口糧食增加了全國的糧食供給總量，大規模精簡城鎮人口減少了城鎮居民的糧食消費總量。儘管國家並未直接向農民提供糧食援助，但由於國家糧食徵購數量顯著下降（作者援引史泰麗[Terry Sicular]的估計，指出「1961年糧食徵購指標和稅收減少了885萬噸，1962年又減少了210萬噸」），所以農民有更多的剩餘糧食來渡過饑荒（頁118）。

至於這次大饑荒的後續影響，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斷。概言之，第一，這場饑荒嚴重加劇了農民對國家的不信任感，進而影響了農民融入社會主義體制的意願（頁239-40）。第二，這場饑荒迫使中共領導層放棄不切實際的發展計劃；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饑荒，國家不得不延緩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頁235）。與現有的相關研究論著

相比，本書的獨特之處是基於全球範圍的長時段歷史考察，突出並強調了這場大饑荒出現的歷史負累因素（「饑荒之國」）和制度性因素（社會主義）。與此相關，本書還提到大饑荒以後中國長期實行糧食進口政策（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初），是確保不再發生饑荒的最重要措施之一（頁117-18）。由此可見，上世紀80、9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以及中國政府對「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的持續關注，絕非空穴來風。

三 不足之處

如前所述，1960年前後的中國大饑荒並非一個全新的研究話題。不過，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後來的研究者要想在一個相對成熟的研究領域中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或者至少具備其中之一）：要麼佔有大量系統的、鮮為人知的新材料，要麼採用與傳統研究方法不同的新路徑。從本書的具體內容看，作者似乎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着明顯的短板，因此作者在〈前言〉將本書定性為一個「『修正性』努力」（頁xxxiv），是恰如其分的。

本書所依據的文獻材料，主要是內部發行的《當代中國糧食工作史料》，以及公開出版的報刊資料、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傳記和少量地方政府檔案。這些史料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常見資料，已經被先行的研究者廣為應用。而一些不大常見的資料，如地方檔案資料和新華社《內部參考》，在書中的應用次

數有限，分布零散，似乎很難據此形成系統的獨立判斷。令筆者印象較為深刻的是，本書提到的若干條《內部參考》資料，由於撰寫者的問題意識和敘述內容與作者並不完全一致，作者不得不對這些資料作出某種引申和推測，才能佐證自己的觀點。如作者提到，即使在《當代中國糧食工作史料》這樣的內部資料中，「1960年上半年這個饑荒最嚴重的時期，很多情況也缺失或不全面，極少提及飢餓的情況。在《內部參考》中，飢餓和饑荒的情況是很難找到的」（頁66）。因為缺乏系統的第一手資料，本書很多至關重要的論斷和數據實際上都是基於二手資料，如羅平漢關於糧食政策的研究論著和楊濤關於人民公社的研究論著。此外，本書內容大量涉及蘇聯1930年代的饑荒，但作者在研究中卻沒有接觸到任何俄文材料，相關論述大多基於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等人的現有論著。

在無法找到大量系統的、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和其他歷史文獻的情況下，作者原本可以借助研究方法的創新來拓展與深化學界的現有認知。研究方法創新的可能途徑之一，是開展長期的、系統的、廣泛的田野調查，大量採集不同類型親歷者的口述歷史。然而，從本書的現有內容看，作者在這方面似乎着力不夠。他在河南農村採集的少量農民口述資料，顯然無法深刻揭示大饑荒的多重成因和多重影響，也無法概括1949年以來全國農村的一般情況。

由於研究資訊不夠充分，本書常常會出現一些不夠客觀、嚴謹的論述。例如，在談到糧食進出口政

後來的研究者要想在一個相對成熟的研究領域中有所創新、有所突破，要麼佔有大量系統的、鮮為人知的新材料，要麼採用與傳統研究方法不同的新路徑。從本書的具體內容看，作者似乎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着明顯的短板。

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農民「瞞產」、「吃青」等「反行為」，但由於缺乏以農民為本位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始終未能說清楚「反行為」到底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還是各級政府官員基於國家本位的主觀判斷作出的無端指控。

策與大饑荒之間的關聯時，作者聲稱：「我做了一個估計，對蘇聯來說：按每人每天600克糧食定量計算，僅1932至1933年的出口就夠養活820萬人一年。這個數字大於一次饑荒所損失的人。對中國來說，按每人每天500克糧食算，1960年的出口足夠養活540萬人一年。這個數字比1960年餓死人的數字低很多。但是如果政府1959年就停止出口，則可以挽救另外2,590萬人的生命。」（頁234）這樣的論斷難免給人留下主觀、武斷的印象。此外，作者在本書第二部分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農民「瞞產」、「吃青」（即偷竊地裏沒有成熟的糧食）等「反行為」，但由於作者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官方文獻和其他人的著述，缺乏與之相對應的、以農民為本位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始終未能說清楚「反行為」到底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還是各級政府官員基於國家本位的主觀判斷作出的無端指控。或許在作者看來，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恰恰是我們賴以判斷國家糧食徵購政策的本質屬性及其社會影響的關鍵所在。

註釋

① 參見Michael Schoenhals,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ockholm: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1987);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London: M. E. Sharpe, 1999); Alfred L. Chan, *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96);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2010)。

③ Penny Kane, *Famine in China, 1959-1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26。

④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59。

⑤ 參見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楊繼繩：《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⑥ 徐州師範大學數學學院教授孫經先曾撰文稱，「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參見孫經先：〈「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紅旗文稿》，2013年第21期，頁20。楊繼繩專題討論了大饑荒期間的中國人口損失問題。據他介紹，國內外學者所認定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在1,700萬至6,000多萬之間，但多數學者的結論在3,000萬上下。詳見楊繼繩：《墓碑》，下冊，第二十三章。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小靜 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